

常州詞派建構之樞紐 ——論董士錫之詞學活動

陳慷玲*

摘 要

常州詞派引起中晚清詞壇之廣大迴響，在清詞史上佔有重要之地位。常州詞派的網絡主要以張惠言之師友群體為核心，逐漸向外拓展而形成，現今研究根據此這條脈絡，以重要詞人為點，架構常派的概貌。在張惠言後，周濟被列為第一重要詞家，但周濟不屬於張氏之師友群體，如何能成為承繼張說之首要詞家？其實，將這沒有交集之兩人繫連起來的中介橋樑，即是張惠言的外甥董士錫。部分研究者雖注意到董士錫，卻未有深入的分析。本論文將聚焦於董士錫，將其置入嘉道時期之時空，說明其詞學活動之傳承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董士錫對老師張惠言的繼承。其二，啟發友朋周濟進入常州詞派。其三，藉由家學傳於其子董毅。成功的延續了常州詞派的發展。

關鍵詞：董士錫、張惠言、周濟、董毅、常州詞派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Pivot of the Chang-Zhou Ci Poetry School – A Study on Dong Shi-Xi's Ci Activities

Chen Kang-L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Chang-Zhou Ci poetry school aroused deep-resounding echoes and therefo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Qing Ci Poetry in the mid- and late Qing Ci circle. The network of Chang-Zhou Ci school network was formed mainly by Zhang Hui-Yen and friends, and was then gradually extended to other Ci writers.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is network to construct the general view of Chang-Zhou school by focusing on important Ci writers. After Zhang Hui-Yen, Zhou Ji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Ci writer, but he didn't belong to the group of Zhang Hui-Yen. How could h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i writer who inherited Zhang's style? In fact, the one who bridged these two writers, who were not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was Zhang's nephew, Dong Shi-Xi. Although some researchers noticed him, but in-depth analyses are still needed to be done.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Dong in the period of Jia-Dao period to demonstrate that his Ci heritage and influence were mainly shown in three aspects: first, how Dong inherited his teacher's style; secondly, how he inspired his friend Zhou Ji to join Chang-Zhou Ci school; thirdly, how he taught his son, Dong Yi, who later became an important Ci writer. By doing so, Dong Shi-Xi successfully continued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Zhou Ci school.

Keywords: Dong Shi-Xi, Chang Hui-Yen, Zhou Ji, Dong Yi, Chang-Zhou Ci school

常州詞派建構之樞紐 ——論董士錫之詞學活動

陳懷玲

一、前言

清代乾嘉時期最主要之兩大詞派即爲常派及浙派。如徐珂所云：「乾嘉之際，作詞者約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於厲鶚，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¹，或如吳梅所云：「乾嘉以還，日就衰頹。皋文與翰風出，而溯源竟委，辨別真僞，於是常州詞派成，與浙派分鑣爭先矣」²，其中常州詞派，自嘉慶年間張惠言兄弟編纂《詞選》一書後，逐漸形成一股龐大的詞學勢力，如清代譚獻《篋中詞》今集三云：「翰風與哲兄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盡，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適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耳」³，或如龍榆生〈論常州詞派〉一文中云：「常州派繼浙派而興，倡導於武進張皋文（惠言）、翰風（琦）兄弟，發揚於荆溪周止庵（濟，字保緒）氏，而極其致於清季臨桂王半塘（鵬運，字幼霞）、歸安朱彊邨（孝臧，原名祖謀，字古微）諸先生，流風餘沫，今尚未全衰歇。……然在張氏兄弟之前，無常州詞派之目。迨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戶誦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

¹ 徐珂，《近詞叢話》，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冊5，頁4223。

² 吳梅，《詞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22。

³ 譚獻，《篋中詞》（《歷代詩史長編》，第二十一種，臺北：鼎文書局，1971），頁171。

其不爲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⁴，由此約略可見常派引起中晚清詞壇之廣大迴響。

常州詞派的勢力網絡主要以張惠言之師友群體爲核心，慢慢向外拓展而形成的，現今相關的論述亦根據這條脈絡，以重要詞人爲點，架構出常派的概貌。而在張惠言之後，周濟多被列爲第一重要詞家。除了上述譚獻、龍榆生如此論述之外，其他相同之看法如嚴迪昌《清詞史》「常州詞派的發展歷程」一章，分爲「張惠言和宛鄰詞人群」、「周濟以及常派其他詞人」二部分；⁵並進一步指出：「常州詞派的旗號只是到了周濟這一輩方始大展」⁶；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一書中將常派分爲三期，其第一期標目爲：「發軔期：從張惠言到周濟」⁷、孫克強亦認爲周濟之《宋四家詞選》「標志著常州詞派的確立」⁸……，張惠言後，周濟成爲常州詞派發展的首要指標，已成學界定論。但令人好奇的是，周濟並不屬於張惠言的師友群體，如何能成爲承繼張說之指標性詞家？其實，將這沒有交集之兩人繫連起來的中介橋樑，即是張惠言的外甥董士錫。

董士錫在常州詞派的發展中具有極重要的關鍵地位，如徐珂《近詞叢話》云常派發展：「……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董士錫也。荆溪周濟，友於士錫，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張氏之說而廣大之。所著《味雋齋詞》及《止齋詞》，堪與惠言之《茗柯詞》，把臂入林。蓋自濟而後，常州詞派之基礎，益以鞏固」⁹，龍榆生〈論常州詞派〉亦云：「張氏詞學之傳，得董氏父子，轉益發揚光大。周止庵受詞法於晉卿，而持論益精，乃復恢張疆宇，而常州詞派遂愈爲世所宗尚」¹⁰，葉嘉瑩〈常州詞派比興寄托之說的新檢討〉復云：「張氏更傳其學於其甥同邑之董士錫，董氏又傳其學於其子董毅，及另一常州人荆溪之周濟。董毅編有《續詞選》，而於詞論則並無申述。至於周濟則編著有《介存齋論詞雜著》、《詞辨》及《宋四家詞選》等書。於是，常州派詞論得周濟之推闡，乃益

⁴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387-388。

⁵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472-498。

⁶ 同前註，頁472。

⁷ 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2。

⁸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66。

⁹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5，頁4223。

¹⁰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390。

得以修正補充而發揚光大」¹¹，張惠言的詞學雖盛極一時，但傳遞工作主要藉由學生輩，董士錫爲其重要弟子之一，他得到張惠言的詞學真傳，並啓發了好友周濟走向常派之詞學道路，拓展了常派的格局，若無董士錫的居中引介，則常派的發展勢必受到侷限。

現今學者雖已留意到董士錫的重要性，但專論之研究卻相對稀少。在詞史詞派的專著中，雖將董士錫視爲一個不可或缺的過渡點，但皆著墨不多，如嚴迪昌《清詞史》第四編第一章第一節之第二部分之「董士錫以及宋翔鳳等」標題下，以一頁半的文字論董士錫；¹²又如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第二章第一節「發軔期：從張惠言到周濟」提到董氏部分近一頁，¹³姚蓉《明清詞派史論》第五章「常州詞派」以短短七行點出董氏爲常派承上啓下之重要人物；¹⁴或如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第三章「浙派詞學及其在後代的反響」中提到常派與浙派的審美理想並非對立，略舉董士錫、董毅、宋翔鳳吸納浙派理論的痕跡，¹⁵上述諸例，皆屬概略介紹性質之文字，約略呈現出董氏之重要性，但並未針對其詞學貢獻加以詳細說明。

至於稍微深入論述，以董士錫爲章節標目者，有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第五章「董士錫對常州詞論的繼承與修正」、主要藉由董士錫之〈周保緒詞序〉一文，分成「論詞注重心理功能」、「創作注重審美價值」、「標舉詞家，以清雅爲高」三部分，闡發董氏之詞學思想；¹⁶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第四章第一節「董士錫對張惠言詞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從董士錫詞學重情、比興、主清三方面，呈現出他對張惠言詞學之矯正、繼承與發展；¹⁷孫克強《清代詞學》第十章第二節「常州詞派概觀」之第二部分爲「董士錫：張、周詞統之關鍵」，約略談到「二張—董晉卿—周濟」之詞統問題，並點出董氏之重要性。¹⁸至於相關之單篇

¹¹ 葉嘉瑩，《清詞叢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174。

¹² 嚴迪昌，《清詞史》，頁496-497。

¹³ 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頁26-27。

¹⁴ 姚蓉，《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07。

¹⁵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165-166。

¹⁶ 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頁265-290。

¹⁷ 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64-76。

¹⁸ 孫克強，《清代詞學》，頁255-257。

論文，僅見清風〈傳薪積火 承前啓後——董士錫對常州詞派的承傳作用〉¹⁹一文，但內容僅有「淵源張氏，得推波助瀾之功」、「齊物論齋詞：悉舉騷雅，門風峻絕」二部分。上述諸論皆未對董士錫進行深入論述。

由前述相關研究之概況來看，董士錫為張惠言至周濟之間的過渡已成定論，論者主要聚焦於此三家之詞論文本，藉此繫連其過渡之脈絡。本文則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將董士錫置入嘉道時期的時空中，更立體的論述其詞學活動的傳承與影響。董士錫之詞學傳播行為，牽涉到師長、友朋、兒子三個層次，在種種密切的互動之中，傳承了張惠言詞學，並傳遞給周濟及董毅，有效推動了常州詞派的建構。本文之章節亦根據此三個面向，結合當時的詞學環境加以論述：首先，從外在環境勾勒張氏詞學網絡的形貌，說明董士錫繼承的可能性，並由董氏詞作及詞論分析其中之張氏詞學的痕跡。其次，論述董士錫啓發周濟進入常州詞派的網絡，使周濟有機會掌握張氏以「創作」為主的詞學精神，並加以闡發引申，提供常州詞派持續茁壯的動力，並奠定自身在常州詞派之地位。最後，董士錫之子董毅編纂《續詞選》一書，此舉具有極強烈的家學傳承之意義。董士錫做為張惠言詞學的繼承者，忠實的在朋友群及親族輩之間，盡到了最佳的傳遞責任，延續了常州詞派的發展。

二、張惠言詞學的繼承者

本節主要以張氏之詞學網絡為背景，分析董士錫在此中之定位及其能成為繼承者的原因。乾嘉時期，張惠言的詞學主張在常州地區引起極大的迴響，陸繼輅〈冶秋館詞序〉一文中曾述及此事，他說：

僕年二十有一始學為詞，則取鄉先生之詞讀之，迦陵彈指，世所稱學蘇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稱學秦柳者也，已而讀蘇辛之詞則殊不然，已而讀秦柳

¹⁹ 清風，〈傳薪積火 承前啓後——董士錫對常州詞派的承傳作用〉，《浙江大學學報》29：4（1999），頁158-160。

之詞，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質先友張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雖然詞故無所為，蘇辛秦柳也，自分蘇辛秦柳為界，而詞乃衰，且子學詩之日久矣，唐之詩人四傑為一家，元白為一家，張王為一家，此氣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於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於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務求其意而已矣，許氏云：意內言外謂之詞，凡文辭皆然，而詞尤有然者」，僕乃益取溫庭筠韋莊以至王沂孫張炎數十家讀之，微窺其所以不能已於言之故。而同時又有皋文之弟宛鄰（張琦）、及左杏莊（左輔）、惲子居（惲敬）、錢季重（黃山）、李申耆（李兆洛）、丁若士（丁履恒）、家劭文（陸耀遹）相與引申，張氏之說，於是盡發。溫庭筠溫韋王沂孫張炎之覆，而金元以來俚詞淫詞叫囂蕩軼之習一洗空之，吾鄉之詞始彬彬盛矣。自是二十餘年，周伯恬、魏曾容、蔣小松、董晉卿、周保緒、趙樹珊、錢申甫、楊劭起、董子誥、董方立、管樹荃、方彥聞，又十數輩皆溺苦為之，其指益深遠，而言益工，文駸駸乎駕張氏而上，而倡之者則張氏一人之力也。²⁰

以張惠言詞論為主所形成的詞學網絡是由內而外，其內層主要是與張氏直接來往的親友所構成，如張琦、左輔、惲敬、錢黃山、李兆洛、丁履恒、陸耀遹，除了陸耀遹外，上述諸家皆見於《詞選》附錄之中，²¹為此詞學網絡之核心人物。由序文「僕年二十有一始學為詞」來推算，陸繼輅生於乾隆三十七年（西元 1772 年），故其學詞之年約為乾隆五十八年（西元 1793 年），而張惠言《詞選》編於嘉慶元年（西元 1797 年），這個核心網絡在西元 1793-1797 年間應已具輪廓，《詞選》的編纂正反映了這個詞學網絡的需求。而張惠言在嘉慶七年（西元 1802 年）辭世後，這個友朋網絡仍持續發展，並推展至較外圍的晚輩詞家，如序文中云：「自是二十餘年，周伯恬、魏曾容、蔣小松、董晉卿、周保緒、趙樹珊、錢申甫、楊劭起、董子誥、董方立、管樹荃、方彥聞又十數輩溺苦為之，其指益深遠，而言益工，文駸駸乎駕張氏而上，而倡之者則張氏一人之力也」，他們的創作皆遵循張氏詞學觀，並取得了

²⁰ 陸繼輅，〈冶秋館詞序〉，《崇百藥齋續集》，卷 3，《續修四庫全書》，冊 14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80。

²¹ 《詞選》附錄之統計：黃景仁《竹眠詞》一首、左輔《念宛齋詞》二首、惲敬《兼塘詞》六首、錢季重《黃山詞》七首、張惠言《茗柯詞》七首、張琦《立山詞》七首、李兆洛《蝸翼詞》五首、丁履恒《宛芳樓詞》三首、陸繼輅《清隣詞》五首、金應城《蘭蓀詞》六首、金式玉《竹隣詞》七首、鄭善長《字橋詞》七首，共計六十三首。《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50-557。

極佳的成績。由於陸繼輅本篇序文所描述者以常州籍詞人為主，故常州以外的參與者皆不在此列。

在張氏詞學網絡實際運作的過程當中，師承關係會比其他關係更具有直接的傳承力量，張氏學生輩在此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張惠言於嘉慶初年至歙縣金榜家授課，嘉慶二年「董士錫年十六，自常來歙從舅父惠言與琦學，……本年在歙受教於先生者，除董士錫外尚有金式玉、金應璩、金應珪、鄭善長及江安甫等」²²，上述諸生除了董士錫為常州人之外，其餘皆為歙人。其中，金應珪作〈詞選後序〉、鄭善長作〈詞選附錄序〉。在鄭氏附錄之十二家中，除了張惠言與張琦之作品外，其他七家為張氏友朋，最末三家則是學生輩的作品，分別是金應璩《蘭蓀詞》六首、金式玉《竹隣詞》七首、鄭善長《字橋詞》七首，從〈詞選附錄序〉中可知，此附錄之詞家經過張氏同意，並非鄭善長任意而為。從上述金應珪及鄭善長對《詞選》所作之序文來看，學生輩確實積極的參與了張氏之詞學網絡。

張惠言離開歙縣之後，至京師受經堂與諸子講學，鮑桂星〈受經堂彙稿序〉一文曾提到張氏的得意門生有「金朗甫、董晉卿、江安甫、楊雲在」²³，此四人最有可能傳承張氏詞學，他們的專長及遭遇可參楊紹文〈受經堂彙稿序錄〉一文，他說：「式玉、士錫工辭賦。而士錫與承之治易及禮，並能通其說。紹文少喜議論，偶有聞見，輒著之於文，習久稍稍得規矩。……嘉慶庚申，承之殤，先生哭之慟，哀其遺學，錄而藏之。壬戌，式玉入翰林，旋卒，先生亦卒」²⁴，張氏師門在嘉慶年間迅速凋零，嘉慶五年江承之卒，嘉慶七年金式玉卒，隨後，張惠言亦卒。四位得意門生僅餘楊、董二人，而楊紹文志在議論文章，對詞學無甚興趣，董士錫辭賦與易經皆佳，他傳承了張氏易學「並能通其說」，吳德旋於〈晉卿董君傳〉中亦云：「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為古文、賦、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²⁵，董氏精於易經，此關鍵讓他成為最有可能傳承張氏詞學之人。

²² 謝忱，〈張惠言先生年譜〉，《常州工業技術學院學報》1（1988），頁46。

²³ 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259。

²⁴ 同前註，頁260。

²⁵ 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影印版），卷77。

張惠言在當代以治《易》聞名，²⁶張惠言的詞學與易經思想是極有關連的，首先，從〈詞選序〉來看，張氏云：「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²⁷，其中「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出自西漢孟喜的《周易孟氏章句》的繫詞（辭）上傳。考察張惠言所治之《易》，主要為虞翻之易學，在他十一種易學著作中，虞氏易的研究就佔了五種，分別是《周易虞氏易》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²⁸在永嘉之亂後，孟喜易僅存闕佚之篇，虞翻作注傳孟氏易，故虞翻為孟喜易學最重要的發揚者。張氏在治《易》之餘，將孟喜「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的觀點應用於詞學領域。

其次，從張惠言的治學歷程來看，他在嘉慶二年至三年間，密集的完成了易學及詞學的著作。張惠言在嘉慶五年四十歲時所作的〈文稿自序〉中，談到文集的編纂是按撰作時間排列：「……故檢次舊所為文，去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為一編，丁巳戊午為一編，存以考他日之進退云」²⁹，其中二編是丁巳到戊午（嘉慶 2-3 年，西元 1797-1798 年，37-38 歲）所作，二編卷上共收文十三篇，順序為〈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周易虞氏義序〉、〈虞氏易禮序〉、〈虞氏易事序〉、〈周易鄭荀義序〉、〈易義別錄序〉、〈易緯略義序〉、〈詞選序〉、〈丁小正鄭氏易注後定序〉、〈畢訓咸詠史詩序〉、〈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莊達甫無名人詩序〉、〈遷改格序〉，其中與易學相關者為七篇，〈詞選序〉錯雜於易學著作中；至於詞學部分，則於嘉慶二年刊刻了《詞選》及《茗柯立山詞》。³⁰大量的易學與

²⁶ 如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云：「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集 1 卷 2，頁 37。或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可以代表清儒易學者不過三家，曰惠定宇、曰張皋文、曰焦里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頁 202。

²⁷ 張惠言，〈詞選序〉，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頁 58。

²⁸ 張惠言，《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清嘉慶至道光間分刊彙印本）中收錄了其十一種易學著作，依次為：《周易虞氏易》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周易鄭氏註》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三卷、《周易鄭荀義》三卷、《易義別錄》十四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辨》一卷。

²⁹ 張惠言，〈文稿自序〉，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頁 118。

³⁰ 丁巳年（嘉慶二年），張惠言及張琦所編《詞選》成，金應珪校刻，先生自序及門人金應珪後序俱

詞學著作完成於同時期，此二者的思維脈絡應處於同一種氛圍下。

因此，張惠言的詞學並非孤立存在，易經實為其重要的背景支持，要掌握其詞學精神，必不能忽視其易學思想。且在嘉慶初期這段時間，正值董士錫向張惠言問學之始，董氏親身經歷此種治學氛圍，最有可能得到張氏易學真傳。除了前述之楊紹文〈受經堂彙稿序錄〉提及董士錫專精張氏易學之外，在張氏卒後，浙江巡撫阮元欲刊張惠言遺書，命陳善擔任校刊工作，董士錫、李兆洛、劉逢祿亦參與校刊，並於嘉慶八年九月完工。當時作序者有阮元〈周易虞氏義序〉、陳善〈周易虞氏義後序〉、董士錫〈張氏易說後序〉，阮元是刊刻者，陳善在嘉慶七年「侍先生於京邸講席，先生授以最後定本」³¹，為書籍之提供者，而董士錫儼然以傳承者的姿態出現，其於〈張氏易說後序〉中云：「……座主中丞阮公，悲先生之身，不獲行其所學，徵其遺書，將刊木而傳之。先生固不藉汲汲以傳其書，然可以使天下皆知先生之學也，故序其後，俾讀者知其指焉。先生姓張氏，諱惠言，武進人，翰林院編修，序其書者，其甥董士錫，嘗受易於先生者也」³²，董氏此序在彰明張氏所有易學著作之要旨，並於文末表示自己受易於張氏的師承關係，與其他作序者不同，傳承意味極濃，而董士錫在張氏卒後所寫的〈祭舅氏文〉亦自云：「殖我者天，成我者師」³³，他的一切來自於老師，易經成就如是，詞學亦如是。精通易學，促成了他傳承張氏詞學的可能性。

實際從董士錫所留下的詞學相關文本來檢視，亦可看出他對張氏詞學闡發之痕跡。首先，其於詞作部分，著有《齊物論齋詞》，董士錫對張氏詞學的傳承，主要藉由詞作來實踐。沈曾植《菌閣瑣談》對此評論云：「《齊物論齋詞》，為皋文正嫡。皋文疏節闊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在晉卿則應徽按柱，斂氣循聲，興象風神，悉舉騷雅。古懷納諸今慢，標碧山為詞家四宗之一。此宗超詣，晉卿為無上上乘矣。玉田所謂清空騷雅者，亦至晉卿而後盡其能事，其與白石不同者，白石有名

署嘉慶二年八月。至於《茗柯立山詞》，則有嘉慶二年刊金應珪序本，見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頁4所錄。

³¹ 陳善，〈周易虞氏義後序〉，張惠言《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清嘉慶至道光間分刊彙印本）。

³² 同前註。

³³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507，頁341。

句可標，晉卿無名句可標，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擬亦在此，仲修備識淵源，對之一詞莫贊，毗陵詞人，亦更無能嗣響者，可謂門風峻絕」³⁴，張惠言主要的詞學精神即是創作，董士錫的詞作不但為「皋文正嫡」，更對張氏「曲子律縛不住者」之音樂瑕疵加以調整，極力發揚張氏詞作精神。

至於其詞論則散見於《齊物論齋文集》一書，其中〈周保緒詞序〉、〈劉冊安詩序〉、〈擬詩品序〉、〈崇百藥齋詩文集序〉……等篇與張氏詞論有密切關係。張惠言詞論之精髓為〈詞選序〉中的這段文字：「……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³⁵，其主旨有二：其一，指出詞體言情的特質，不是風花雪月無病呻吟，而是賢人君子不得不發之情感，藉歌曲發抒。其二，表現手法為「興於微言」，更具體的說，即是「詩之比興」。故董士錫於〈周保緒詞序〉一文中云：「士不能出其懷持以正於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發而為文，以見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故曰：君子之道，修身以待命，正也，怨，非正也。雖然將抑其情而不予之，遂邪抑之，不以其氣慘黯而不舒，其體屈撓而不寧，而偏激躁矜之疾生，故君子之道，不引乎情，不可以率乎禮，蓋及其治心澤身之學既大成，其幾微過中之情，固可以漸而化之，然則吾徒俯仰一世，感慨人已，情之所發，跌蕩往反固所不能自己者也。周子保緒，工於為詞，隱其志意，崑於比興，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論深至，溫良可風」³⁶、或如〈劉冊安詩序〉中所說：「……有不得已於言者，惟於詩發之，然猶托諸比興，撫時感物，切而不迫，故其詩雋而恬，摯而婉」³⁷，再如〈擬詩品序〉一文：「……然而身與世相入，而人事纖悉之端，有不能不動於中，激為言者，及其成文，托物相比，緣情起興，旨哉可味也」³⁸、又如〈崇百藥齋詩文集序〉云：「其為詩也，組繪不傷意，琬鍊不傷韻、紆婉不傷氣，志之所之，與境之所經，皆寓焉，驟觀之，

³⁴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4，頁3607。

³⁵ 張惠言，〈詞選序〉，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頁58。

³⁶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507，頁309-310。

³⁷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507，頁309。

³⁸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1507，頁311。

若不知其有爲而言者，油油然蓄然後出之，詩人之內心也」³⁹……。上述諸例，皆根據張惠言〈詞選序〉之兩大主旨引申發展，呈現出明顯之對應痕跡。

三、開啟周濟詞學之常派道路

從詞史觀點來看，周濟爲常州詞派發展的重要指標，他原與張惠言詞學網絡無甚關連，透過董士錫的居中引介，才促使周濟步上常派道路。周濟〈詞辨序〉云：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綿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敘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託。白石疏放，醞釀不深。而晉卿深詆竹山粗鄙。抵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⁴⁰

周濟生年爲乾隆四十六年（西元 1781 年），學詞之年約是嘉慶二年（西元 1797 年）張惠言編纂《詞選》之際，至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方結識董士錫，因仰慕其詞作而「受法晉卿」，兩人在填詞切磋中對宋代詞家看法各異而展開了討論。在這個過程中，創作爲首要基礎，詞論則是後續之附屬產物。董士錫是張氏詞學的實踐者，一生之詞學著作以《齊物論齋詞》爲代表，周濟因爲佩服董士錫的詞作而進入了張惠言的詞學網絡，自己亦致力於詞體創作，著有《存審軒詞》，其於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之〈自序〉中云：「詞之爲技小矣，然考之於昔，南北分宗，徵之於今，江浙別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兩先生開闢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旨趣，

³⁹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507，頁 308。

⁴⁰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6。

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競出，晉卿集其成。余與晉卿議論或合或否，要其指歸，各有正鵠，倘亦知人論世者所取資也，既刻詩，乃并平時所為詞刻之，兩先生往矣，聊以質之晉卿焉」⁴¹，周濟此序推尊張氏詞作的開闢之功，並肯定了董士錫「集其成」之創作地位，說明了自身詞作的學習對象，主要透過董士錫而上溯張惠言。

譚獻《篋中詞》對周濟詞作的評價云：「止庵自為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⁴²，極度肯定周濟詞作對張惠言的傳承。周濟在這樣的創作過程中，進一步對張惠言詞學加以闡發引申。張氏《詞選》中之評語特別喜歡比附政事，將詞作結合詞人所處之政治環境加以評說，周濟的詞學觀即奠基於張氏的基礎上，他早在嘉慶十七年（西元 1812 年）的《介存齋論詞雜著》中就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⁴³，將詞體提升至歷史的高度，具有補足史實之作用，擴大了張氏詞論中所強調之個人感士不遇的範圍；並於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之〈存審軒詞自序〉一文中凝鍊出「知人論世」的說法，更在道光十二年（西元 1832 年）之〈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提出：「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以無厚入有間」⁴⁴，在張氏比興寄託說的基礎上，加以變化發展。從周濟這三十年間之詞論主張來看，誠如潘祖蔭〈宋四家詞選序〉中云其：「與董晉卿輩，同期復古，意仍張氏，言不苟同」⁴⁵，清楚的指出周濟其對張氏詞學的承繼與擴充。

周濟推崇董士錫的創作成就並加以學習，此舉確實掌握住張惠言詞學之核心精神。張惠言的詞學著作僅有《詞選》一書，而詞學理論主要見於〈詞選序〉，單薄的詞學架構，卻能引起中晚清詞壇的廣大迴響，應是張氏始料未及的。其實張氏編纂《詞選》時，並無開派的意識，張琦〈重刻詞選序〉云：「嘉慶二年，余與先兄

⁴¹ 周濟，《存審軒詞》，《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6，頁 1。

⁴²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4，頁 4009。

⁴³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附於《詞辨》一書之前，《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7。

⁴⁴ 周濟，《宋四家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92。

⁴⁵ 周濟，《宋四家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91。

皋文先生同館歙縣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窳宦不關，門戶卒迷。乃與余校錄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⁴⁶，原來編纂《詞選》之目的爲指導創作，爲了教授金榜家之子弟填詞所需之讀本，因此〈詞選序〉一文僅是授課時的輔助說明，簡陋的詞論架構因而得到了合理的依歸。

清代的詞選書籍數量非常多，其選詞動機與篇幅各有不同，陳廷焯曾將《詞選》與朱彝尊的《詞綜》相較，他說：「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⁴⁷，姑不論陳廷焯與常派的淵源，我們直接比較此二書的篇幅與選詞動機：《詞選》選錄唐、五代、宋词凡 44 家、116 首，爲教習填詞時之示範讀本，內容精簡，歷來詞評多以「嚴」、「約」稱之；⁴⁸至於《詞綜》，則爲一部大型詞選，由朱彝尊與汪森纂輯，共收唐至金元時期詞作二千多首，詞人六百五十多家，其選詞動機爲存詞，廣泛的搜集各家詞集並加以保存，⁴⁹與張惠言《詞選》做爲創作範本的性質明顯不同。而張惠言弟子金應珪〈詞選後序〉所提出的「近世爲詞，厥有三蔽」之說，亦是針對創作時的缺點而發。當代的填詞之不良風氣有「淫詞」、「鄙詞」、「游詞」等三蔽，造成此現象的根本原因即是習作的選本雅鄭不分，金應珪是這樣說的：「昔之選詞者，蜀則《花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乖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皇芻。概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⁵⁰，再次說明了《詞選》具有極強的創作示範性質，期望能藉此導正詞壇的風氣。

⁴⁶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 796-797。

⁴⁷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4，頁 3777。

⁴⁸ 如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云：「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词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或如陳銳《褒碧齋詞話》云本朝詞選以「張皋文最約」。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4，頁 3222、4200。

⁴⁹ 《詞綜》選詞動機如汪森〈詞綜序〉所云：「友人朱子錫鬯，輯有唐以來迄於元人所爲詞，凡一十八卷，目曰《詞綜》，訪予梧桐鄉。予覽而有契於心，請雕刻以行。朱子曰：『未也。宋、元詞集傳於今者，計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見，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輔吾不足，然後可。』」汪森，〈詞綜序〉，朱彝尊、汪森，《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

⁵⁰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頁 799-800。

張惠言《詞選》樹立了以創作為主的編纂精神，周濟受法於董士錫後，亦留意於詞選之編輯，他一生共完成兩部詞選著作：其一是嘉慶十七年（西元 1812 年）編纂之《詞辨》，其二是道光十二年（西元 1832 年）編纂之《宋四家詞選》。此二書在張氏《詞選》的基礎上，以更具體的方式指導填詞者的學習路徑。首先，《詞辨》一書之編纂，是應弟子田端的要求所編，周濟〈詞辨序〉云：「……余客授吳淞。弟子田生端，學爲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岸略，庶幾他日有所觀省。爰錄唐以來詞爲十卷」⁵¹，並於《詞辨》跋文云：「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紕繆精采間出爲七八卷，本事詞話爲九卷，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⁵²，周濟此選本清楚的標出由優至劣之詞作層次。張氏《詞選》只錄出值得學習的詞作，周濟則將詞作區分爲六個等級（扣除非詞作之第九卷本事詞話）；金應珪〈詞選後〉提到當時詞有三蔽之現象，周濟則將此類庸選惡札之詞作列於第十卷，具體的呈現出可學與不可學之作品，創作示範性又比《詞選》更進一步。因此潘曾瑋〈周氏詞辨序〉云：「介存自序，以爲曾受法於董晉卿，晉卿亦學於張氏者。介存之詞，貳于晉卿。而其辨說，多主張氏之言，久欲刻而未果。其所選與張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釐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因樂爲敘而刊之」⁵³，點出了《詞辨》一書對張氏《詞選》之繼承。

至於《宋四家詞選》一書，則更清楚的舉出宋詞四家做爲學習對象，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饜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瑩瑩，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罣飛英，

⁵¹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6。

⁵²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9。

⁵³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5。

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譬效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續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54

將此與《詞辨》相較：《詞辨》之第一卷錄正體作者 18 家，第二卷錄變體作者 15 家，但是《宋四家詞選》在這 33 家作者中，凝鍊出其中四家詞爲學習範本，學習徑路爲「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同時更具體提出「以無厚入有間」的創作策略，藉此發展張惠言的寄託說，並於所錄各詞中附以眉批註記，對填詞者而言，是極具步驟的實際操作指導。陳匪石《聲執》對周濟這兩部詞選評曰：「而周氏之造述，更有進於張氏者，詞辨所附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之敘與論及眉評，皆指示作詞之法，並評論兩宋各家之得失，示人以入手之門，及深造之道……自周氏書出，而張氏之學益顯，百餘年來詞徑之開闢，可謂周氏導之。至其能識屯田、夢窗，評論確當，則不僅彌張氏之缺憾，且開後此之風氣矣」⁵⁵。

其中周濟所提出「以無厚入有間」之說，似非周濟本人之創發，而是與董士錫切磋後之論點。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卷二有相關的記載，他說：「壬子秋，雨翁與余論詞，至有厚入無間，輒斂手推服曰，昔者吾友董晉卿每云，詞以無厚入有間，此南宋及金元人妙處。吾子所言，乃唐、五代、北宋人不傳之祕。惜晉卿久亡，不克握麈一堂，互證所得也」⁵⁶，從引文來看，董士錫亦曾提到「以無厚入有間」之論點，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論及此問題云：「董士錫和周濟曾切磨詞學，故『無厚入有間』一語，究係由誰先用來談詞，不得而知，把它當成兩人的見解，我想亦無不可」⁵⁷，吳宏一並於同書注釋 142 云：「『無厚入有間』語出《莊子》。董士錫酷愛莊子，其文集、詞集都以『齊物論齋』爲名，則『無厚入有間』一語似

⁵⁴ 周濟，《宋四家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92。

⁵⁵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5，頁 4965。

⁵⁶ 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4，頁 3652。

⁵⁷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202。

應由董士錫先提出。但今傳的董士錫《齊物論齋集》中，找不出有關詞的見解。而周濟則將之應用到詞論中，所以把它當成兩人的『切劘』之餘的共同意見，似較妥當」⁵⁸，可見董士錫對周濟詞論的影響。

周濟因為結識董士錫而進入了張惠言的詞學網絡中，董士錫不但具有啓迪之功，更對周濟之詞學內涵造成全面而深入的影響。周濟從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認識董士錫後，其詞學著作主要有嘉慶十七年（西元 1812 年）之《詞辨》、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之《存審軒詞》、道光十二年（西元 1832 年）之《宋四家詞選》，近三十年來的詞學結晶，皆與董士錫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濟於〈詞辨序〉與〈存審軒詞自序〉中直接敘述其受學於董士錫之經過及對張惠言詞學的認同，〈宋四家詞選序〉中所提出的「以無厚入有間」之詞論，更是他與董士錫兩人討論後的共同意見。由於董士錫的居中傳授，使周濟能夠準確的掌握張惠言以創作爲主的詞學精神，並在兩人之切磋討論中，突破了張氏詞論的格局、並有效拓展常州詞派的視野。周濟之所以能成爲常州詞派重要的詞家，董士錫功不可沒。

四、董毅《續詞選》之家學意義

董士錫對張氏詞學的推展主要藉由兩條徑路，其一是友朋方面，開啓了周濟的常派因緣；其二則是血親方面，其子董毅編纂《續詞選》，意在承續張惠言《詞選》。本節論述重點爲董毅編纂《續詞選》的家學意義，由此書可看出家族性的詞學傳承，其成書主要牽涉到張惠言、張琦、董士錫三人。

董毅《續詞選》刊刻於道光十年七月（西元 1830 年），張琦〈續詞選序〉：「詞選之刻，多有病其太嚴者，擬續選而未果，今夏外孫董毅子遠來署，攜有錄本，適愜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⁵⁹，張琦是《詞選》之共同作者，他認爲《詞

⁵⁸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頁 202。

⁵⁹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頁 797。

選》的缺點是「病其太嚴」，但一直沒有修正，因此對於外孫董毅編輯《續詞選》一書給予極高的評價，不但云此書「適愜我心」，亦為「先兄之志」，完全認同此書延續了《詞選》之價值。

我們直接從這兩書之內容比對，來看《續詞選》對《詞選》繼承與創新。首先從二書所錄篇數及詞家來看，《詞選》所錄詞作為 44 家 116 首、《續詞選》為 53 家 122 首，董毅仍是延續著張氏精簡的選詞策略。在唐詞部分，《詞選》共錄 3 家 20 首，《續詞選》共錄 4 家 9 首，重覆的詞家為李太白、溫飛卿兩人，新增之詞家為皇甫子奇、張子同兩家共 3 首；五代詞部分，《詞選》錄 8 家 26 首，《續詞選》錄 6 家 13 首，重覆之詞家為韋端己、馮正中兩人，新增之詞家有後唐莊宗、薛昭蘊、毛熙震、李珣等四家共 7 首；宋詞部分，《詞選》共錄 33 家 68 首，《續詞選》共錄 43 家 100 首，重覆之詞家有 17 家，新增之詞家有 26 家共 34 首。由上述數據統計，《續詞選》中重覆詞家之總數為 21 家、新增之詞家總數為 32 家，故《續詞選》之新增率約為 6 成，重覆率約為 4 成。顯示董毅之《續詞選》一書，在張氏《詞選》的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的改革。

若由二書所錄之詞家作品數量來排名，則《詞選》前三名分別為溫飛卿 18 首、秦少游 10 首、南唐後主 7 首；《續詞選》前三名為張叔夏 23 首、秦少游 8 首、周美成與姜堯章各為 7 首。比較此二者，二書對秦少游的收錄分別為 10 首及 8 首，認知最為接近；《詞選》排名第一之溫飛卿 18 首，《續詞選》只錄 5 首；《詞選》排名第三之後主 7 首，《續詞選》完全未收。此狀況亦再次說明了董毅《續詞選》對《詞選》不但有傳承，更具有革新的部分。

更具體的由內容來看，亦可見《續詞選》對《詞選》之補充。如《詞選》收錄蘇軾〈水龍吟〉一詞，其調下小序云「和章質夫楊花韻」，而《續詞選》則將章質夫原詞錄出，以便兩者對照。或如《詞選》錄辛幼安〈祝英臺近〉「寶釵分」一詞，其下評曰：「此與德祐太學生二詞用意相似，點點飛紅，傷君子之棄，流鶯，惡小人得志也，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⁶⁰，《續詞選》則錄出《詞選》中所云之德祐

⁶⁰ 張惠言，《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46。

太學生〈百字令〉及〈祝英臺近〉二詞，並於〈百字令〉詞末評曰：「見湖海新聞，三四謂眾宮女行，五謂朝士云，六謂臺官默，七指太學生上書，八九謂只陳宜中在，東風謂賈似道飛書傳羽，北軍至也，新塘楊柳謂賈妾」。〈祝英臺近〉詞末評曰：「穉柳謂幼君，嬌黃謂太后，扁舟飛渡，謂北軍至，塞鴻指流民也，人惹愁來謂賈出，那人何處謂賈去」⁶¹，董毅不但在《詞選》的基礎上，做更完善的資料補充；且其述評方式，亦完全依循張惠言《詞選》比附政事的詮釋模式。

以上藉由《續詞選》之書名、選詞及內容之分析，可明顯的看出其傳承《詞選》並適度加以革新的意圖，此舉得到張琦的認可，這與董毅之家學必然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董貽清〈蛻學齋詞跋〉云：「族叔子遠先生爲貽清童子師，先年有續詞選一刻，淵源張氏，不媿外家宗風，大江南北久已風行，至其生平著作亦沈博絕麗，尤工倚聲，惜庚申之變，盡歸零落」⁶²，董毅工於倚聲，又撰《續詞選》一書，雖說是外家宗風，但他與張惠言畢竟相隔兩代，張惠言逝世後之隔年董毅始出生，兩人並無交集，故董毅之詞學教養主要仍來自於其父董士錫，由於董毅的著作大部分毀於戰火，未留下可以參看的相關資料，我們從《續詞選》中仍然可看出董士錫對董毅之影響。

董毅《續詞選》入選詞作之前三名共有四家，張叔夏 23 首、秦少游 8 首、周美成 7 首、姜堯章 7 首。董毅最重視的四位詞家，與董士錫的觀點極爲接近。董士錫曾於〈餐華吟館詞序〉中標舉出六位典範詞家，其中亦包括《續詞選》中排名前四之張、秦、周、姜，他說：「蓋嘗論之，秦之長清以和、周之長清以折、而同趨以麗，蘇辛之長清以雄、姜張之長清以逸，而蘇辛不自調律，但以文辭相高，以成一格，此其異也。六子者，兩宋諸家皆不能過焉」⁶³，董氏認爲兩宋詞家以周、秦、蘇、辛、姜、張六人爲代表，董毅特別關注的周、秦、姜、張，董士錫也與周濟論詞時提到過，周濟〈詞辨序〉云：「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

⁶¹ 董毅，《續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3。

⁶² 董毅，《蛻學齋詞》，收錄於董康輯《廣川詞錄》民國 29 年（1940）刊本。

⁶³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507，頁 310。

而余遂篤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託。白石疏放，醞釀不深。而晉卿深詆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⁶⁴，可見董士錫對此四家之高度重視，應對董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而董士錫對姜張的注意，更是拓展了《詞選》的視野，論者一般認爲浙、常二派壁壘分明，⁶⁵但其實並不然，董士錫於〈餐華吟館詞序〉一文云：「昔柳耆卿、康伯可未嘗問，乃以其鄙慢之辭，緣飾音律，以投時好，而詞品以壞。姜白石張玉田出，力矯其弊，爲清雅之製，而詞品以尊。……則以浙西六家獨尊姜張之故……然學秦病平、學周病澀、學蘇病疏、學辛病縱、學姜張病膚。蓋取其麗與雄與逸，而遺其清，則五病雜見，而三長亦漸失……」⁶⁶，董氏以客觀的態度評價姜張，高度稱許其「清雅之製」使「詞品以尊」，將姜、張與周、秦、蘇、辛並列，並提醒創作者務必掌握其「清」之基本精神。陳水雲對此評論：「這就避免了浙派末流的空枵，又修正了張惠言思想中尙意輕格的理論偏向。董士錫的審美理想被其子董毅以詞選的方式落實下來……姜、張詞合補入 30 首，占增補總數的四分之一。這說明董毅是有意識的糾正張惠言的過失，而吸收了浙派詞學某些合理的成份」⁶⁷，董毅《續詞選》對張惠言《詞選》的承繼及創新，主要是透過其父董士錫的居中傳授，汲取其異於張惠言之詞學觀，對《詞選》做了更爲融貫的調整。

其實從《續詞選》的編纂時間來看，亦可發現此時期張氏家族對張惠言詞學的關注。《續詞選》刊刻於道光十年七月（西元 1830 年），而在同年四月，張琦曾再版重新校定《詞選》並刊刻，張琦〈重刻詞選序〉云：「……版存於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刊焉。嗚呼！憶余同先兄選此詞，迄今已三十四年，而先兄沒已二十九年矣。當時之樂，豈復可得；今日之悲，其何能已。是選先兄手定者居多，今故列先兄名而余序之云爾」⁶⁸，序文中所云「同志之乞是刻者

⁶⁴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頁 576。

⁶⁵ 如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卷一云：「近來浙吳二派，俱宗南宋，獨常州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窺唐人微旨……」，唐圭璋，《詞話叢編》，冊 4，頁 3633-3634。

⁶⁶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507，頁 310。

⁶⁷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頁 166。

⁶⁸ 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頁 797。

踵相接」，說明了《詞選》之再版是因為文化市場反映出熱烈的需求現象，張琦因而重新校訂此書並刊刻。此書自嘉慶二年初版以來至道光十年已過了三十四年，這麼多年後仍有如此眾多的需求者，顯示張惠言詞學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未因其辭世而衰歇。張琦在〈續詞選序〉曾表示想擬續選以修正此書「太嚴」之問題，可惜一直未付諸行動，而三個月後，董毅《續詞選》一書付梓出版，完成了張琦「擬續選而未果」之願望，編纂如此迅速之原因，應想趁著此股熱潮，更進一步的拓展張氏詞學之精神，且此書亦得到張琦「適愜我心……亦先兄之志」的讚譽，說明了家學的動力促成了《續詞選》的成書。

令人好奇的是，在這個家族熱衷於《詞選》與《續詞選》的再版及編選之際，為何董士錫一直未曾參與？包世臣〈齊物論齋文集序〉云董氏「晚更困於病」⁶⁹，吳德旋於〈晉卿董君傳〉一文亦云：「君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瘤敗而卒」⁷⁰，董士錫可能因為晚年受病痛之苦，而無法參與這次家族的詞學活動，並於隔年（道光十一年，西元 1831 年）⁷¹逝世，享年約五十歲。董士錫雖然未曾加入道光十年的編纂推廣活動，但其詞學觀點已含融於董毅編選之《續詞選》一書中，透過其子董毅，默默的完成張惠言詞學之家族傳承。

五、結論

常州詞派創始自張惠言，張惠言主要之詞學著作為《詞選》，此書是為了教授金家子弟所編之讀本，指導創作為其主要的詞學精神。董士錫身為張惠言的姪子及學生，專精易學及文學，在張氏辭世後，成為其詞學最重要之傳人，深得其創作精神，畢生之詞學著作雖然僅有《齊物論齋詞》一種，但他卻是張氏創作論的實踐者，

⁶⁹ 包世臣，〈齊物論齋文集序〉，《藝舟雙楫·論文》，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冊 6，頁 5276。

⁷⁰ 吳德旋，〈晉卿董君傳〉，《初月樓文鈔續》，卷 6，《叢書集成續編》，冊 15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554。

⁷¹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頁 1437。

藉由具體的詞作實踐而傳遞張氏詞學。

從他一生的詞學活動來看，主要透過朋友及家族兩條徑路推展張氏詞學。首先，在朋友方面，啓發了周濟常州詞派的道路，周濟於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認識董士錫，因仰慕其詞作而「受法晉卿」，從此進入常州詞派的詞學網絡，其詞學著作分別是西元 1812 年的《詞辨》、西元 1823 年的《介存齋詞》、西元 1832 年的《宋四家詞選》，皆扣緊了張惠言詞學的創作精神。其中第一、三種爲詞選，在張氏《詞論》的基礎上，以更具體的方式指導填詞者的學習路徑。《詞選》錄唐宋词作 44 家 116 首，《詞辨》則有十卷，依優劣排序，第一卷以飛卿起爲正，第二卷以南唐後主起爲變，第三、四卷爲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第五、六卷爲平安清通纔及格調者，第七、八卷爲大體紕繆精采間出者，第九卷爲本事詞話，第十卷爲庸選惡札迷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者。具體的呈現出可學與不可學之作品，創作示範性又比《詞選》更進一步。而在二十年後所編之《宋四家詞選》，則凝鍊出《詞辨》一、二卷中之四家詞爲學習範本，學習徑路爲由王沂孫入手、歷吳文英、辛稼軒，而返周邦彥之渾化，發展了張惠言的寄託說，更具體提出「以無厚入有間」的創作策略，並於所錄各詞中附以眉批註記，對填詞者而言，是極具步驟的實際創作指導。因此從常州詞派的發展來看，周濟成爲具指標性的重要詞家。

其次，在家族方面，董士錫之子董毅編纂了《續詞選》一書，在張惠言《詞選》之基礎上，加以修正及補充。《續詞選》延續著張氏精簡的選詞策略，述評方式，亦完全依循張惠言《詞選》比附政事的詮釋模式。此二書所收錄之詞家，《續詞選》之新增率約爲 6 成，重覆率約爲 4 成，在張氏《詞選》的基礎上，做了較大幅度的改革。若從所錄詞家作品數量前三名來看，《續詞選》之排序爲張叔夏 23 首、秦少游 8 首、周美成與姜堯章各爲 7 首，與《詞選》前三名之重覆詞家只有秦少游，可看出《續詞選》對《詞選》的繼承與修正。至於董士錫對董毅的影響，可從董毅最重視的四位詞家來看，此四家都在周濟與董士錫兩人論詞的名單之列，且《續詞選》收錄最多的詞家作品爲張炎之 23 首，但此非董毅之創見，董士錫曾推崇過張炎，故此觀點應來自於董士錫。

董士錫一生默默從事詞體創作，由於其詞學著作僅有《齊物論齋詞》一種，故

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但他在具體創作的實踐過程中，影響了周濟與董毅的詞學發展，此二人不但有各自的詞集，更完成了三部詞選作品：周濟之《詞辨》、《宋四家詞選》；董毅之《續詞選》，暫時抒解了張惠言辭世後的空窗危機，使常州詞派得以順利的成長茁壯。從這條常派之發展脈絡來看，董士錫往前傳承張氏詞學，往後開啓周濟及董毅的詞學道路，拓展了常州詞派的發展能量，其居中引介之功，不容忽視。

引用書目

張惠言，《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張惠言，《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清嘉慶至道光間分刊彙印本。

張惠言著、黃立新校點，《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吳德旋，《初月樓文鈔續》，《叢書集成續編》，冊 15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陸繼輅，《崇百藥齋續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包世臣，《藝舟雙楫·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周濟，《詞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周濟，《存審軒詞》，《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周濟，《宋四家詞選》，《續修四庫全書》，冊 1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5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阮元，《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董毅，《蛻學齋詞》，收錄於董康輯《廣川詞錄》民國 29 年（1940）刊本。

譚獻，《篋中詞》，臺北：鼎文書局，《歷代詩史長編》第二十一種，1971。

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施蛰存，《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吳梅，《詞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葉嘉瑩，《清詞叢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 朱惠國，《中國近世詞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朱德慈，《常州詞派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陳水雲，《清代詞學發展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 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
- 姚蓉，《明清詞派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 謝忱，〈張惠言先生年譜〉，《常州工業技術學院學報》1（1988），頁 40-52。
- 清風，〈傳薪積火 承前啓後——董士錫對常州詞派的承傳作用〉，《浙江大學學報》4（1999），頁 158-160。